

“弱智者的威胁”：戈达德与19、20世纪之交美国对智力缺陷者的形象建构及其影响

王光伟

摘 要：“弱智者的威胁”是20世纪初美国学者亨利·戈达德系统阐述的对智力缺陷者的看法，旨在论证对智力缺陷者展开社会控制的必要性。1908年，戈达德率先把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引入美国，用以分类和识别智力缺陷者，并作为塑造后者负面形象的重要工具。戈达德借助家族谱系研究，把绝大多数智力缺陷塑造成“遗传性弱智”。在此基础之上，他又借助智力测试，强调智力缺陷是造成贫困、卖淫、犯罪等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且美国儿童智力缺陷者数量众多，“弱智者的威胁”形象由此确立。“弱智者的威胁”命题虽不是肇始于戈达德，但他“科学”地论证了它的真实性，进而推动美国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婚姻限制、隔离和绝育等措施，以消除智力缺陷。实际上，这些措施反映的是一种工具理性，忽视了智力缺陷者的基本权利，同时也缺乏严谨的科学基础，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目的。

关键词：美国；戈达德；智力缺陷者；社会控制

中图分类号：K7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2)06-0177-10

19、20世纪之交，伴随着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深入，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趋于恶化，智力缺陷者、罪犯、贫民、酒鬼及妓女等群体的数量快速增加，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美国社会精英接受和发展了英国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创立的优生学(Eugenics)，并掀起一场颇具影响的优生学运动，主张利用遗传学知识来提高人口素质，作为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案，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当时，戈达德在美国优生学界可谓是名声赫赫，无人不晓，甚至一度与美国优生学先驱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齐名。除了优生学家的身份外，他还是一名心理学家，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州瓦恩兰培训学校(The Training School at Vineland)心理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智力缺陷的研究工作。戈达德一生著述甚丰，以《卡里卡克家族：弱智遗传研究》^①扬名于世，该书不仅阐明了他对智力缺陷者的总体认知，而且奠定了他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优生学界的声望和地位。^②戈达德在观察智力缺陷时，通常会根据当时的遗传学知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视为一种遗传缺陷，是对社会的严重威胁。“弱智者的威胁”命题虽不是肇始于戈达德，但戈达德却借助家族谱系研究和智力测试，系统论证了这一命题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为美国强化对智力缺陷者的社会控制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由此，戈达德的大名便与“弱智者的威胁”密切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遗传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智力测试被质疑难以揭示先天智力，

作者简介：王光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天津 300071)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优生学与20世纪初美国对边缘群体的社会控制”(2021M701783)、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传染病与19世纪美国公共卫生发展研究”(ZB22BZ0309)、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传染病与近代以来欧美社会变迁研究”(ZB21BZ0208)

① “弱智”一词是 Feeble-mindedness 的中译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指代各种类型的智力缺陷，不含中文语境下的贬义。

② Henry Goddard, *The Kallikak Family: A Study in the Heredity of Feeble-Mindednes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2.

家族谱系研究被认为缺乏严谨的科学基础,智力缺陷的遗传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怀疑,“弱智者的威胁”命题逐渐销声匿迹,但在20世纪初,这种负面形象确实对美国的智力缺陷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美国智力缺陷者,国外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一些学者把注意力放在介绍美国智力缺陷者培训机构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时期这些机构照顾和教育智力缺陷者的方法;^①还有一些学者在考察美国的优生学运动时,重点阐述了美国针对智力缺陷者的绝育措施。^②这些研究通常会涉及对“弱智者的威胁”的描述及戈达德相关论述的介绍,对了解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精英对智力缺陷者的看法和戈达德的观点很有帮助,但它们描述“弱智者的威胁”形象时,往往只是简单提及,未展开详细论述。国内学界暂时还没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以戈达德为中心,考察他如何运用智力测试和家族谱系研究,论证和强化智力缺陷者的“弱智者的威胁”形象,进而揭示出19、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精英对智力缺陷者的看法及其影响。

一、识别“弱智者”:戈达德与比奈-西蒙智力量表的引入

自人类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作为精神疾病的智力缺陷便随之出现。关于智力缺陷者的文字记录,目前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成书的《埃伯斯纸草文稿》(Papyrus Ebers)。^③在基督教出现以前,智力缺陷者通常是被嘲弄、厌恶和虐待的对象。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人往往把存在智力缺陷的婴儿扔进河流或掷入山谷,通过杀婴来消灭成为社会负担的人群。到了古罗马时代,达官贵人们争相雇佣智力缺陷者为仆从,以此为娱乐。^④随着基督教的兴起,欧洲国家看待这类人群的态度发生了分化。在中世纪,智力缺陷者在不少地区被称为“上帝之子”。与之相反,近代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和加尔文则把他们视作恶魔。^⑤上述态度明显充斥着宗教色彩,当然会对智力缺陷者的妥善照顾产生消极影响。直到19世纪初,治疗和教育智力缺陷者的科学尝试才真正拉开序幕。值得注意的是,导致智力缺陷的病因众多,且不同智力缺陷者的智力水平参差不齐。鉴于此,当时的医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往往会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首先对智力缺陷者进行分类,以便对症治疗,更好地展开教育。分类依据包括病因、语言能力、学习能力及社会生存能力等。^⑥总体而言,这些分类方式能够大致区分不同类型或不同程度的智力缺陷者,也可以作为识别智力缺陷者的辅助工具,不过它们大多未能阐明不同程度的智力缺陷者之间的明确界限,更遑论轻度智力缺陷者与智力正常者的具体差异。等到20世纪初,戈达德通过运用比奈-西蒙智力量表,似乎解决了这一问题。

1908年,作为宾夕法尼亚州瓦恩兰培训机构心理实验室主任的戈达德前往欧洲考察,通过比利时教育家奥维德·德克洛利(Ovide Decroly)接触到比奈-西蒙智力量表。这项智力测试工具最初诞

① Albert Deutsch, *The Mental Ill in America: A History of Their Care and Treatment from Colonial Tim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6; R. C. Scheerenberger, *A History of Mental Retardation*, Baltimore: Paul H. Brookes, 1983; Peter L. Tyor and Leland V. Bell, *Caring for the Retarded in America: A Histor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4; James W. Trent, *Inventing the Feeble Mind: 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② Mark H. Haller, *Eugenics: Hereditarian Attitudes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3; Daniel Kevles,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Genetics and the Uses of Human Hered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hilip R. Reilly, *The Surgical Solution: A History of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Wendy Kline, *Building a Better Race: Gender, Sexuality, and Eugenics from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 the Baby Boo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Harry Bruinius, *Better for All the World: The Secret History of Forced Sterilization and America's Quest for Racial Puri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6.

③ Scheerenberger, *A History of Mental Retardation*, p. 10.

④ Deutsch, *The Mental Ill in America*, p. 333.

⑤ Stanley Powell Davies, "Social Control of the Feeble-minded,"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23, p. 26.

⑥ Maetin Barr, *Mental Defectives: Their History, Treatment and Training*, Philadelphia: P. Blakiston's Son, 1904, pp. 78-90.

生于法国。1904年，法国政府请求心理学家比奈·阿尔弗雷德（Binet Alfred）寻找一种诊断和分类智力低下儿童的方法，用于在公立学校中识别学习进度缓慢的学生，以便进行针对性教育，提高教学效率。翌年，比奈与同事西奥多·西蒙（Theodore Simon）合作设计出一套基于心理年龄的分类方案，即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它包括30个难度递增的项目，考察被测试者的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和语言能力等心理功能，被测试者完成不同难度的项目意味着拥有不同的心理年龄，而心理年龄的高低则对应着他们的智力水平。^①1908年和1911年，比奈又先后修订比奈-西蒙智力量表。作为一种识别和分类智力缺陷者的创新方法，戈达德很快将其引入美国。

为了验证比奈-西蒙智力量表的准确性，戈达德先后进行多次实验。1910年，他对瓦恩兰培训学校的400名智力缺陷者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心理年龄为1岁的学生有36人，2岁37人，3岁40人，4岁37人，5岁42人，6岁39人，7岁47人，8岁44人，9岁30人，10岁14人，11岁5人，12岁7人。根据该校教师和工作人员的经验，测试结果正确揭示出绝大多数智力缺陷者的智力水平，戈达德由此认为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可以精准地测量智力。^②

戈达德的实验没有局限在培训机构，还拓展到美国公立学校。1910年秋，他测试了新泽西州的1547名学生，结果如下：554人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符；329人的心理年龄超出实际年龄1年，49人超出2年，14人超出3年，2人超出4年；312人的心理年龄落后实际年龄1年，156人落后2年，79人落后3年，37人落后4年，8人落后5年，6人落后6年，1人落后7年。在戈达德看来，人的智力呈正态分布，而这些统计数据可绘制成一条钟形曲线，显然是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准确性的有力证明。^③

正是基于比奈-西蒙智力量表的准确性，戈达德提出了智力缺陷者的新分类，并得到美国弱智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Feeble-Minded）的采纳。他把智力缺陷者分为三个等级：心理年龄不超过2岁，智力发育严重滞后的是白痴（Idiots）；心理年龄高于2岁，但不超过7岁的被称为痴愚（Imbeciles）；心理年龄介于8至12岁的被命名为愚笨（Morons），而三者统称弱智者（The Feeble-Minded）。^④需要指出的是，比奈认为，智力并非固定不变，良好的教育可以起到提高智力的作用，但在戈达德看来，智力测试的结果反映的是一种先天智力，后天环境因素难以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总体而言，相较于其他分类方案，比奈-西蒙智力量表提供了一套判断智力水平的可量化标准，似乎可以更加精准地识别不同类型的智力缺陷者，因而迅速在美国流行。对戈达德本人而言，比奈-西蒙智力量表的重要性还不仅限于此，它的引入为其论证美国智力缺陷者的社会威胁形象提供了貌似科学的工具。

二、家族谱系研究与“遗传性弱智”的证实

20世纪以前，肺结核、癫痫、酗酒、梅毒及生育意外，都被视为导致智力缺陷的原因。^⑤当然，不少人也注意到遗传在产生智力缺陷中的作用，法国精神病学家贝内迪克特·莫雷尔（Bénédict Morel）更是构建起解释智力缺陷的退化理论。1857年，他在《退化论》（*Traité des dégénérescences*）一书中指出，智力缺陷、酗酒、癫痫、犯罪和精神疾病是遗传退化的不同表现形式，而遗传退化的根

① 关于1905年比奈-西蒙智力量表的具体内容，详见 Henry Goddard, “The Binet and Simon Tests of Intellectual Capacity,” *Training School Bulletin*, vol. 5, no. 10 (1908), pp. 3-9.

② Henry Goddard, “Four Hundred Feeble-Minded Children Classified by the Binet Method,” *Journal of Psycho-asthenics*, vol. 15, no. 1-2 (1910), pp. 18-19.

③ Henry Goddard, “Two Thousand Normal Children Measured by the Binet Measuring Scale of Intelligence,” *The Pedagogical Seminary*, vol. 18, no. 1 (1911), pp. 234, 236.

④ “Minutes of the Association,” *Journal of Psycho-asthenics*, vol. 15, no. 3-4 (1911), p. 134.

⑤ Henry Goddard, “The Heredity Factor in Feeble-Mindedness,” *The Institution Quarterly*, vol. 4, no. 2 (1913), p. 9.

源可能在于先祖酗酒、工作条件恶劣、生活方式不健康或违反道德准则。^① 尽管莫雷尔提出遗传退化可以引起智力缺陷,但未能阐明它在代际之间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莫雷尔提出的遗传退化假说不过是一家之言,缺乏坚实的研究基础,那么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达格代尔(Richard Dugdale)率先展开的家族谱系研究,为人类不良特征的遗传提供了重要证据。1874年,他受纽约州监狱协会委托,巡查该州北部的13座县监狱,研究犯罪的原因及遏制之法。在阿尔斯特县监狱,达格代尔发现6名囚犯具有亲缘关系,同属朱克家族,而他们的29名直系血亲中,17人曾被逮捕,15人因谋杀、强奸未遂、盗窃等行为被定罪。随着继续深入调查,他把朱克家族的祖先追溯到18世纪的一家五姐妹。自她们开始,7代人中间产生了128名妓女,18名妓院老板,76名罪犯,206名接受救济的贫民。基于朱克家族的谱系研究,他指出:“尤其是对于贫困和放荡而言,环境一旦持续性地影响大脑组织,便可能产生遗传的习惯。”^② 可见,达格代尔同莫雷尔一样,信奉的是拉马克式的“软遗传”,认为犯罪、贫困和疾病可能与遗传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后天环境。

尽管达格代尔的研究对象不是智力缺陷,但他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智力缺陷具有借鉴意义。关于家庭谱系研究的价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在为《朱克家族》作序时,曾高度评价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克家族》第一版的出版是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调查的最佳范例。”^③ 戈达德正是利用这种所谓“科学”的方法和智力测试,开始考察智力缺陷与遗传的关系。

当戈达德开始家族谱系调查,研究智力缺陷时,遗传学知识已经发生变化,拉马克的遗传学说遭到质疑。1883年,德国细胞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提出种质连续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人体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细胞:生殖细胞和体细胞。前者位于生殖腺,产生精子和卵子,而后者组成其他身体组织。体细胞易受环境影响,而生殖细胞的遗传不受环境影响,会代代不变地传递下去。^④ 同魏斯曼的种质连续学说一样,孟德尔遗传规律也冲击了拉马克的遗传学说。早在1866年,奥地利修士格里高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已经发表《植物杂交实验》一文,指出适用于某些植物的遗传规律,但被长期埋在图书馆的期刊文献之中,直到1900年,才被欧洲的三位科学家重新发现,然后公之于众。孟德尔遗传规律最初是从豌豆杂交实验中得出。如果把高茎豌豆和低茎豌豆杂交,第一代只有高茎豌豆;如果让这些豌豆自行繁殖,下一代得到的高茎豌豆和矮茎豌豆的比例是3:1;如果任由矮茎豌豆自行生长,无论经过多少代,都只会产出矮茎豌豆。基于实验结果,孟德尔把植物的某些特性称为“单位性状”(Unit Character)。随着人类遗传研究的深入,孟德尔遗传规律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植物,而且适用于人类的某些特征,比如发色、眼睛颜色、白化病、短指症及夜盲症等。^⑤ 既然豌豆高矮以及人的发色、短指等是单位性状,那么智力是不是单位性状?带着这个问题,戈达德开始了对智力缺陷者的家族谱系研究。

为了调查瓦恩兰培训学校中智力缺陷者的家族谱系,戈达德专门培训了一批田野工作者,前往各地搜集信息。当考察在世的家族成员是否存在智力缺陷时,田野工作者会运用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和现场观察,而若要判断已过世的家族成员的精神状况,他们往往借助他者的描述。1912年,根据田野工作者收集的资料,戈达德出版了他的第一份家族谱系研究成果,题为《卡里卡克家族:弱智遗传研究》。这项研究比较完整地再现了瓦恩兰培训学校中一个名叫黛博拉·卡里卡克(Deborah Kallikak)的“弱智”女孩的家族谱系。她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志愿民兵马丁·卡

① Haller, *Eugenics*, p. 14.

② Robert L. Dugdale, *The Jukes: A Study in Crime, Pauperism, Disease and Heredity*,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10, pp. 7-8, 69, 66.

③ Dugdale, *The Jukes*, p. iii.

④ Diane B. Paul, *Controlling Human Heredity: 1865 to the Present*,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5, p. 41.

⑤ Goddard, *The Kallikak Family*, pp. 109-111.

里卡克，他曾在一家酒馆邂逅了一名存在智力缺陷的女性，两人育有私生子小马丁·卡里卡克，后者一脉共产生480名后代。其中，143人是智力缺陷者，46人智力正常，其他人情况不明。与小马丁一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丁的另一支后代。独立战争结束后，马丁转而迎娶了一位贵格会女教徒，这桩婚姻中产生的后代无一例外都是智力正常，且受人尊敬的公民。据此，戈达德指出，卡里卡克家族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两个分支却显示出不同品质的原因在于血统。^①言下之意，卡里卡克家族的智力缺陷源自遗传，不受后天环境的影响。

黛博拉所在的卡里卡克家族不过是戈达德家庭谱系研究的对象之一，他的整个研究涉及瓦恩兰培训学校的327名智力缺陷者。1914年，他发表了第二份更加完整的家庭谱系研究，即《弱智：它的原因及影响》。这项研究主要得出三点结论：一是在327名智力缺陷者中，164人的智力缺陷源自家族遗传，还有34人的状况可能与遗传有关；二是智力是一种单位性状，并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律；三是智力缺陷者的生育率至少是正常人的两倍。^②如果说《卡里卡克家族》证明了智力缺陷与“硬遗传”之间的联系，那么《弱智》则明确指出多数智力缺陷属于“遗传性弱智”，并具体阐明了它们的遗传规律。

戈达德的家族谱系研究成果一经问世，迅速成为美国优生学运动中最受欢迎的出版物，尤其是《卡里卡克家族》。不过，戈达德的家族谱系研究明显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根据邻居、亲戚及其他人的描述，判断早已离世之人是否存在智力缺陷，显然不具备多少可信度。第二，田野工作者的现场观察有时也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成分。伊丽莎白·凯特（Elizabeth Kite）是卡里卡克家族的主要调查者，她曾这样描述被调查的卡里卡克家族成员：“一眼便足以确定他的智力低下”，“她长得很漂亮，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和一双忧郁的黑眼睛，但她没有思想。脸上明晃晃地显露出呆滞”。^③类似观察得出的结果恐怕很难令人信服。第三，戈达德在调查之初已经预设智力缺陷的遗传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1912年，田野工作者简·格里菲斯（Jane Griffiths）向戈达德提交一份材料，记录了一个父母存在智力缺陷，而两名子女智力正常的家庭。戈达德提醒她，这些孩子应该是智力缺陷者，他们现在年龄尚小，智力缺陷会在以后逐渐显现。^④由此可见，戈达德的家庭谱系研究并不是一种科学方法，不过是在搜集支持多数智力缺陷属于“遗传性弱智”且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律的证据。

总之，戈达德通过家庭谱系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大部分智力缺陷塑造成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并按照孟德尔遗传规律在代际之间传播，同时强调智力缺陷者的生育率很高，初步论述了“弱智者的威胁”命题。

三、智力测试与“弱智者的威胁”形象的确立

作为遗传性疾病的“弱智”只是戈达德建构的“弱智者的威胁”形象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之上，他借助智力测试，把智力缺陷与贫困、卖淫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勾连，并强调美国儿童智力缺陷者的人数众多，“弱智者的威胁”形象由此确立。

19世纪中期，美国开始出现智力缺陷者培训机构。当时的机构主管们基于法国精神病医生爱德华·赛甘（Edouard Seguin）的生理学教育方法，一边指出智力缺陷者是社会负担，一边宣扬他们是可教育的对象，是潜在的生产者。1848年，马萨诸塞州一家培训机构的主管塞缪尔·豪（Samuel

① Goddard, *The Kallikak Family*, pp. 18, 53.

② Henry Goddard, *Feeble-Mindedness: Its Cause and Conseque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6, p. 47, 556, 568.

③ Goddard, *The Kallikak Family*, pp. 73, 78.

④ Leila Zenderland, *Measuring Mind: Henry Herbert Goddard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Tes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89.

Howe)曾这样描述智力缺陷者:“他们不仅对生产毫无贡献,反而成为贪婪的消费者,他们无所事事,招惹是非,是国家物质繁荣的沉重负担。更有甚者,他们需要被时刻照看,以防胡作非为,这占据了更勤劳、更有价值者的大量时间。”^①豪显然是从经济角度看待智力缺陷者带来的社会负担。机构主管们多赞同豪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通过培训机构的特殊教育,智力缺陷者不仅可以摆脱成为社会负担的命运,而且可以在回到社区后,找到工作,自食其力,成为生产者。1858年,马萨诸塞州另一家培训机构的主管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在一次演讲中宣扬了曾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培训机构接受教育的两名智力缺陷者的成功故事。一人在缅因州一家工厂找到工作,另一人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家工厂谋得职位,后者8岁时尚不会行走,12岁时不会讲话,似乎毫无改善的希望。^②机构主管们积极塑造智力缺陷者的“社会负担”和“潜在的生产者”形象,主要旨在突出培训机构在改善智力缺陷、减轻社会负担方面的价值,以争取私人捐赠和政府拨款,吸引父母把存在智力缺陷的子女送到培训机构接受特殊教育。

19世纪90年代以后,以培训机构主管为代表的专业人士根据自身对智力缺陷者的长期观察,逐渐把这一群体视为社会威胁。早在1893年,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培训机构主管沃尔特·费尔纳德(Walter Fernald)就曾指出:“聪明的弱智者难以明辨是非,易受恶习的影响,沦为流浪汉、醉鬼和小偷。”^③费尔纳德不是唯一把智力缺陷与一系列社会问题挂钩的人。1910年,安妮·摩尔(Anne Moore)在向纽约市公共教育协会(Public Education Association)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弱智者对当今文明是一种威胁,……这种缺陷通常是遗传的,且无法治愈,会导致贫困、退化、犯罪和疾病。”^④与两者不同,戈达德主要利用比奈-西蒙智力量表的测试结果作为证据,更加系统、“科学”地阐释了智力缺陷与各类社会问题之间的因果联系,同时指出美国儿童智力缺陷者的数量庞大,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弱智者的威胁”命题的可信度。他的阐释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首先,智力缺陷的自然结果是贫困。在戈达德看来,智力缺陷可以像钩虫病一样,令本能自食其力之人变得整日无所事事,懒惰成性,最终陷入贫困,也可以令人难以掌握谋生的手艺,进而无法参与社会竞争,不得不依靠亲属或济贫院的照顾。为了佐证智力缺陷致贫的观点,他专门提到对济贫院的调查结果:不少于50%的被收容者存在智力缺陷。^⑤戈达德把智力缺陷与贫困联系起来,意在指出智力缺陷者带来的社会负担。

其次,智力缺陷造成不少卖淫活动。戈达德认为,部分“弱智”女性难以控制正常性欲,自然容易走上卖淫这条相对轻松的谋生之道,沦为妓女,还有部分“弱智”女性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于智力低下,缺乏防骗意识,被人诱拐为娼。他援引不少证据来论证这种观点。证据之一是奥尔加·布里奇(Olga Bridgman)在伊利诺伊州一家管教所中得到的智力测试结果,在被关押的104名妓女中,97%存在智力缺陷。另一个证据来自贩卖妇女为娼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White Slave Traffic),1914年,该委员会对300名妓女展开智力测试,发现154人存在明显的智力缺陷,另外135人也很可能是智力缺陷者。^⑥戈达德论述智力缺陷与卖淫之间的因果联系,其意旨在表明智力缺陷者腐蚀道德,败坏社会风气。

再次,智力缺陷是犯罪的重要原因。戈达德指出,智力缺陷者无力与正常人竞争工作机会,一些

① Samuel G. Howe, *Report Made to the Legislature of Massachusetts, upon Idiocy*, Boston, Printed from the State, 1848, p. 51.

② “Pennsylvania Training School for Feeble-Minded Children,”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Pennsylvania Training School for Feeble-Minded Children*, Philadelphia: Henry B. Ashmead, 1858, p. 55.

③ Walter E. Fernald, “The History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Feeble-Minded,” in Isabel Barrows, 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 vol. 20, Boston: Press of Geo. H. Ellis, 1893, p. 211.

④ Anne Moore, *The Feeble Minded in New York*, New York: United Charities Building, 1911, p. 11.

⑤ Goddard, *Feeble-Mindedness*, pp. 16-17.

⑥ Henry Goddard, “The Menace of the Feeble-Minded,” *Pediatrics*, vol. 23, no. 1 (1911), p. 352; Goddard, *Feeble-Mindedness*, pp. 14-16.

沦为乞丐，自生自灭，一些依靠亲友或济贫院照顾，但还有一些会试图通过不正当的方法维持生计，进而走上犯罪的道路，而“他们的犯罪类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环境。如果他们与既邪恶又聪明的人在一起，就会成为执行他们危险计划的上当受骗之人”。^① 为了证明智力缺陷与犯罪的关系，他列举了多家机构内罪犯的智力测试结果。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管教所，56名女性少年犯中间，52人存在智力缺陷。^② 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被关押的12名罪犯中间，10人是智力缺陷者。^③ 根据上述数据，戈达德得出结论：“罪犯是后天养成的，而非天生。制造罪犯的最好材料，也许也是最常见的材料，就是弱智。”^④ “弱智”是制造罪犯的“材料”，这种描述旨在说明智力缺陷者威胁社会秩序。

最后，美国儿童智力缺陷者的实际人数超过预期。学者克特·戈维兹（Kurt Gorwitz）曾梳理了1840年至1890年期间的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得出下列数据：1840年，美国每10万人中有51.5名智力缺陷者，1850年68.1名，1860年60.3名，1870年63.6名，1880年153.3名，1890年152.6名。^⑤ 这些数据与戈达德在学生群体中得到的智力测试结果相去甚远。1910年，他对新泽西州的2000名学生进行智力测试，结果显示3%的学生存在智力缺陷。^⑥ 1911年，他结合纽约公立学校“慢班”（Ungraded Class）学生的智力测试结果，指出纽约公立学校至少存在1.5万名智力缺陷者，约占学生总数的2%。^⑦ 在戈达德看来，上述比例可能仍难以准确揭示美国儿童智力缺陷者的实际人数，但也足以表明“他们的人数比过去发现的要多得多”。^⑧ 戈达德阐述美国儿童智力缺陷者的人数之多，目的在于强调智力缺陷者带来的社会负担之重，对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潜在危害之大。

综上所述，“弱智者的威胁”是19、20世纪之交不少美国社会精英对智力缺陷者的共同看法，而非戈达德率先提出的命题，但他借助家族谱系研究和智力测试，系统论证了“弱智者的威胁”的“真实性”，为20世纪初美国强化对智力缺陷者的社会控制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四、“弱智者的威胁”与美国对智力缺陷者的社会控制

如果说戈达德“科学”地证明了智力缺陷多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是造成贫困、卖淫和犯罪等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那么“向全国弱智者提供服务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Provision for the Feeble-Minded）则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宣传和教育活动，试图把“弱智者的威胁”从专业人士内部交流的观点变为大众的信条。

“向全国弱智者提供服务委员会”与戈达德所在的瓦恩兰培训学校颇有渊源。早在1910年，瓦恩兰培训学校就成立了“向弱智者提供服务委员会”（Committee on Provision for the Feeble-Minded），主要负责组织游说活动，筹集机构运营经费。1913年，“向弱智者提供服务委员会”被扩充为“推广部”（Extension Department），专门开展全国性的民众教育，并协助其他州培训机构向立法机构游说，争取政府拨款。^⑨ 到1914年底，在铁路大亨遗孀哈里曼夫人的资助下，“推广部”进一步扩展为“向全国弱智者提供服务委员会”，总部设在费城。该委员会的宗旨是“传播关于弱智蔓延和弱智威胁的

① Goddard, *The Kallikak Family*, pp. 55-56.

② Henry Goddard and Helen F. Hill, "Delinquents Girls Tests by the Binet Scale," *Training School Bulletin*, vol. 8, no. 4 (1911), p. 51.

③ Henry Goddard and Helen F. Hill, "Feeble-Mindedness and Criminality," *Training School Bulletin*, vol. 8, no. 1 (1911), p. 3.

④ Goddard, *The Kallikak Family*, p. 54.

⑤ Kurt Gorwitz, "Census Enumeration of the Mentally Ill and the Mentally Retard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alth Services Reports*, vol. 89, no. 2 (1974), p. 183.

⑥ Goddard, "Two Thousand Normal Children Measured by the Binet Measuring Scale of Intelligence," pp. 236-237.

⑦ Henry Goddard, *Report on Educational Aspects of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of the New York to the Committee on School Inquiry of the Board of Estimate and Apportionment*, Part 2, New York, 1911-1912, p. 12.

⑧ Goddard, *Feeble-Mindedness*, p. 6.

⑨ Zenderland, *Measuring Mind*, pp. 228-229.

知识,提出控制并最终在美国人民中间根除弱智的方法”。^①

基于上述宗旨,“向全国弱智者提供服务委员会”通过巡回展览和巡回演讲等方式向民众传播“弱智者的威胁”。就巡回展览而言,委员会曾在费城组织了一场大型展览,参观者达 10 万余人。^②在巡回演讲方面,据委员会外勤秘书历山大·约翰逊(Alexander Johnson)统计,从 1915 到 1918 年间,仅他一人便在美国 33 个州的 350 座城镇做了 1100 次演讲,听众约 25 万人。至于宣传力度,瓦恩兰培训学校主管爱德华·约翰斯通(Edward Johnstone)表示,凡是大众报刊上出现涉及智力缺陷与犯罪、酗酒、妓女及流浪汉关系的文章,都与“推广部”及“向全国弱智者提供服务委员会”的宣传有关。^③该委员会大力传播“弱智者的威胁”,旨在为美国强化对智力缺陷者的社会控制争取民众支持。

针对“弱智者的威胁”,戈达德推荐过三种方案,以解决遗传导致的智力缺陷:一是婚姻限制;二是隔离;三是绝育。^④这些方案不是戈达德的原创,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已经开始在美国实施,但随着 20 世纪初“弱智者的威胁”形象的广泛传播,它们在更大范围内得以运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隔离逐渐开始成为一些培训机构应对“弱智者的威胁”的重要手段。1898 年,宾夕法尼亚州弱智儿童培训学校(The Pennsylvania Training School for Feeble-Minded Children)主管马丁·巴尔(Martin Barr)在《国际伦理杂志》上发文指出,可在西部无主土地或大西洋沿岸未开发的土地上建立聚居地,长期隔离“正迅速成为国家长期威胁”的智力缺陷者。^⑤出于对隔离的信心,新培训机构不断涌现,原有培训机构也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就数量而言,1888 年以前,全国 14 个州共成立了 15 家培训机构。^⑥随着 20 世纪初“弱智者的威胁”论调愈发尖锐,培训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1904 年,拥有培训机构的州为 21 个,1924 年上升到 31 个,1927 年达到 42 个,此时全国共有培训机构 59 所。^⑦在机构数量增加的同时,机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1904 年,美国的培训机构有 14347 名学生,1910 年增加到 20731 人,1923 年达到 4.3 万人。^⑧20 世纪初,尽管美国培训机构的数量大大增加,规模快速扩大,被隔离的智力缺陷者人数也持续攀升,但智力缺陷者的总量远超培训机构的承载量,同时智力缺陷者的亲属也未必愿意把他们送到培训机构之中,因此隔离仅被运用于小部分智力缺陷者。

禁止结婚是美国减少智力缺陷的另一个解决办法。1895 年,康涅狄格州通过了美国第一个禁止智力缺陷者结婚的法律。它规定,除非女方年龄在 45 岁以上,否则若是任意一方存在智力缺陷,均不得结婚。对于促成上述婚姻的人,最高处以 1000 美元罚款和 1 年监禁。另外,凡是与 45 岁以下的智力缺陷者发生性关系的男性,至少监禁 3 年。凡是愿意与男性智力缺陷者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也要受到同样的惩罚。^⑨与康涅狄格州相比,1905 年印第安纳州通过的婚姻法在美国引起了更多关注,主要包括三点内容:一是禁止智力缺陷者结婚;二是被培训机构释放的智力缺陷者须提供健康证明,否则不得结婚;三是为了规避印第安纳州法律,而在其他州缔结的所有婚姻无效。^⑩到 1914 年,大约

① “A Committee to Eradicate Feeble-mindedness,” *Survey*, vol. 34, no. 17 (1915), p. 369.

② Haller, *Eugenics*, p. 128.

③ Trent, *Inventing the Feeble Mind*, pp. 168-169.

④ Goddard, “The Heredity Factor in Feeble-Mindedness,” p. 11.

⑤ Martin Barr, “Defective Children: Their Needs and Their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8 (1898), pp. 487-488.

⑥ Reilly, *The Surgical Solution*, p. 13.

⑦ Maria Norma Pascucelli, “Growth of Institutions for the Mentally Retar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ster thesis, 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College, 1961, pp. 22-24.

⑧ Reilly, *The Surgical Solution*, p. 13; Trent, *Inventing the Feeble Mind*, p. 181.

⑨ Lawrence B. Goodheart, “Rethinking Mental Retardation: Education and Eugenics in Connecticut, 1818-1917,”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vol. 59, no. 1 (2004), pp. 106-107.

⑩ Jessie Spaulding Smith, “Marriage, Sterilization and Commitment Laws Aimed at Decreasing Mental Deficienc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vol. 5, no. 3 (1914), p. 366.

30 个州颁布新婚姻法或修改原有婚姻法，绝大多数把智力缺陷者作为禁止结婚的对象。^① 截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41 个州禁止智力缺陷者结婚。^② 尽管多数州先后制定了限制智力缺陷者结婚的法律，但它们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因为这些婚姻法从未得到严格执行，同时也不会对智力缺陷者的性生活和生育造成直接影响。

除了机构隔离和婚姻限制外，绝育也是消除智力缺陷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美国，绝育最初被认为具有惩罚和治疗的作用。1887 年，俄耳甫斯·埃弗茨（Orpheus Everts）提出对罪犯进行阉割的建议。^③ 1894—1895 年，堪萨斯州白痴与痴愚少年收容所（Kansas State Asylum for Idiotic and Imbecile Youth）主管霍伊特·皮尔彻（Hoyt Pilcher）阉割了数十名智力缺陷者，以治疗手淫和纠正其他不良行为。^④ 尽管阉割的惩罚作用和治疗效果得到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可，但这种手术过于残忍，且剥夺了人的正常性功能和尊严，遭到公众的强烈抵制。到了 20 世纪初期，随着对身体损伤更小的输卵管切除术和输精管结扎术的普及，同时在“弱智者的威胁”形象的影响下，绝育开始被视作防止智力缺陷者生育的有效办法。当时，美国不少州陆续通过了针对智力缺陷者的绝育法。1907 年，印第安纳州颁布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绝育法，该法授权对本州培训机构内无法改善的智力缺陷者实施绝育手术。之后，类似的绝育法在其他州纷纷出现。截至 1917 年，包括印第安纳州、加利福尼亚州等 15 个州颁布了绝育法；到 1931 年，这个数字又上升到 28 个。^⑤ 根据这些法律，从 1907 年至 1929 年，美国共有 10877 人被绝育，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智力缺陷者。^⑥ 相较于美国智力缺陷者的总量，被绝育的人数有限，同时智力缺陷者的遗传相当复杂，并非遵循简单的孟德尔遗传规律，因此绝育也难以实现消除智力缺陷的目的。

总体而言，20 世纪初，当戈达德运用“科学”工具，系统地论证“弱智者的威胁”的真实性之后，这种负面形象开始在美国社会广泛传播，进而推动美国在更大范围内实施隔离、婚姻限制和绝育等措施，以控制智力缺陷者的生育，竭力减少这一群体的数量。

结 语

19 世纪 90 年代，遗传在导致智力缺陷中的作用被愈发强调，同时智力缺陷与犯罪、卖淫和贫困等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被频繁提及，“弱智者的威胁”逐渐浮出水面。到了 20 世纪初，基于魏斯曼的种质连续学说和孟德尔遗传规律，作为优生学家和培训机构管理者的戈达德借助家族谱系研究和智力测试，貌似“科学”地证实了“弱智者的威胁”的真实性。需要指出的是，家族谱系研究一开始便预设智力缺陷者的遗传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律，同时田野工作者往往根据自身观察和直觉去判断被调查者的精神状态。另外，比奈-西蒙智力量表最初不过是用来辨别学习进度缓慢的学生，后被戈达德作为区分和识别智力缺陷者的标准，并强调其结果反映的是先天智力。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心理学、遗传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智力测试的结果被认为会受到教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揭示先天智力，家族谱系研究被质疑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智力缺陷的遗传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律也越来越受到怀疑，“弱智者的威胁”形象逐渐消失。可见，“弱智者的威胁”并非事实，而是 19、20 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精英建构出来的污名，即使是戈德达的论证也缺乏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

① Kevles,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p. 99.

② Mark Oliver, “Eugenic Marriage Laws of the Forty Eight States,”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37, p. 27.

③ Orpheus Everts, “Asexualization as a Penalty for Crime and Reformation of Criminals,” *Cincinnati Lancet-Clinic*, vol. 20 (1888), pp. 377–380.

④ Barr, *Mental Defectives*, pp. 195–196.

⑤ Harry Hamilton Laughlin, *Eugenical Ster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Psychopathic Laboratory of the Municipal Court, 1922, pp. 15, 5; Mary S. Edwards, “Legislative Trends in 1931,” *Journal of Social Hygiene*, vol. 17, no. 7 (1931), p. 404.

⑥ Reilly, *The Surgical Solution*, p. 97.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以戈达德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之所以刻意制造智力缺陷者的“弱智者的威胁”形象，主要出于以下原因。对于培训机构主管而言，渲染“弱智者的威胁”，强调隔离的价值，可以争取更多的政府拨款，建立新培训机构，并进一步扩大现有培训机构的规模，同时巩固自身作为研究智力缺陷的知识权威地位。对于优生学家而言，为了阻止种族退化，必须遏制智力缺陷的传播，而强调“弱智者的威胁”，推行包括隔离、限制性婚姻法和绝育等一系列限制智力缺陷者生育的措施，与优生学的观念和主张桴鼓相应。从根本上讲，美国通过控制生育的方式，最终达到消灭智力缺陷者的做法可以避免其他社会改革见效慢、成本高的缺点，更加高效地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节约社会成本，但这种社会控制的代价却是由智力缺陷者承担，反映的是一种工具理性，忽视了智力缺陷者的基本权利。同时，这种做法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其预期目的最终也未能实现。

“The Menace of the Feeble Minded”: Henry Goddard and the Image-building of the Mentally Retarded in Americ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Influence

Wang Guangwei

Abstract: “The Menace of the Feeble Minded” was a systematic view of the mentally retarded articulated by the American scholar Henry Goddar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iming to demonstrate the necessity of social control over the mentally retarded. In 1908, Goddard took the lead in introducing the Binet-Simon Scal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used to classify and identify the mentally retarded,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tool to shape the negative image of the latter. Goddard used family studies to portray the majority of the mentally retarded as hereditary defectives. On this basis, Goddard also used intelligence tests to demonstrate that Mental retardation was an important cause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poverty, prostitution and crime, and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us establishing the image of “The Menace of the Feeble Minded”. Although Goddard was not the origin of the proposition of “The Menace of the Feeble Minded”, he “scientifically” argued for its truth, which led to a wider implementation of marriage restrictions, segregation, and sterilization to eliminate mental retard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act, these practices reflected a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at ignore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mentally retarded and lacked a rigorous scientific basis, and they ultimately failed to achieve their intended goals.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Henry Goddard; The mentally retarded; Social control

（责任编辑：史云鹏）